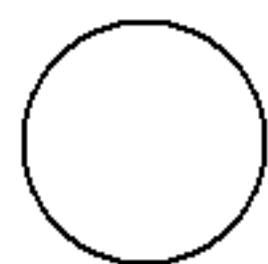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9

一九六三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三年第九期 ★

目 录

短 美国统治集团在古巴问题上的
论 争吵说明了什么?.....郭济洲 (1)

加 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虞挺英 (5)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
问题.....许 毅 戴园晨 (8)

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阶级
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谬论.....庄福龄 (1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
斗争 (续).....郑言实编 (21)

☆ 五月一日出版 ☆



美国统治集团

在古巴问题上的争吵说明了什么？

郭济洲

美国统治集团在去年十月对古巴实行军事封锁和战争挑衅失败以后，对下一步怎样侵略古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甚至把这场争吵渲染成为一场国内的“政治风暴”。

美国参议员基廷、戈德华特和史坦尼斯等人，多次发表演说，攻击肯尼迪政府在古巴问题上表现得“虚弱和混乱”，主张对古巴执行更加“强硬坚定的政策”，直到武装入侵，“一劳永逸地”把革命的古巴消灭掉。美国垄断资本的巨头、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也指责肯尼迪政府“反复无常和优柔寡断”，表示不满。肯尼迪在回答基廷之流的“激动的指责”的时候，强调他从来都希望把革命的古巴“铲除掉”，但怎样“铲除”，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他并且把这办法称作“最明智的政策”。肯尼迪的一些谋士如参议员富布赖特、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等人，也都出来为肯尼迪帮腔，指责基廷之流叫嚷是“不负责任”，是“大吹大擂招摇过市”，是“大唱高调”而不想作“忍辱负重的工作”，是企图让肯尼迪政府作出“非常不明智的事情”。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也大为肯尼迪政府捧场喝采，竭力想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把这个双手沾满古巴人民鲜血的帝国主

义头子塑造成一副“明智”的形象。

肯尼迪所无耻吹嘘的这套“最明智的政策”究竟是什么货色呢？用美国资产阶级报刊的说法就是：一方面，对古巴采取“慢慢扼杀”的办法，另一方面，对拉丁美洲各国采取军事镇压和政治欺瞒“双管齐下”的手段。

肯尼迪政府在去年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它不仅派遣间谍飞机继续在古巴上空肆无忌惮地进行“侦察”，组织大批武装特务潜入古巴，发动反革命的“游击战”，而且搜罗了三千多名古巴反革命分子，把他们直接编入美国部队，进行特种训练，准备“有朝一日”发动入侵，打回古巴。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操纵“美洲国家组织”强迫拉丁美洲各国集体干涉古巴，指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反动当局，向巴西、墨西哥等国施加压力，逼迫这些国家与古巴绝交，并且纠合中美洲国家的反动派建立包围和孤立古巴的“围墙”，推行它的“外交和政治隔离”计划。肯尼迪政府还向它的西欧伙伴施加压力，阻止它们的船只为古巴运送货物，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不仅如此。肯尼迪还叫嚷美国对整个拉丁美洲“负有责任”，必须对这个地区“予以



注意”和“关切”。他的这种叫嚷，固然是企图利用所谓古巴的“威胁”作烟幕，进一步控制拉丁美洲各国；同时，也是为了“稳定”住这些国家的反动统治，以便更放手地侵略古巴。正是在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目标下，肯尼迪政府在加紧干涉古巴的同时，还狡猾地运用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加紧破坏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在军事镇压方面，美国国防部已经把巴拿马运河区作为镇压拉丁美洲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美国“特种部队”的基地和“反游击部队”的训练中心，在那里成立了“特种部队”第五支队，其中的一千二百名“反游击队”士兵已分别被派到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直接参加镇压当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美国在拉丁美洲训练的反动军官人数，也将过去三年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今年的五千七百人。在政治欺骗方面，肯尼迪政府正在拉丁美洲加紧推销什么“争取进步联盟”，伪装出一副“关心”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贫困落后的样子，从美国垄断资本在这个地区掠夺来的巨额利润中，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点，搞什么“社会福利”，妄想以这种小恩小惠来缓和拉丁美洲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尖锐矛盾，阻止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通过这种办法，在“援助”的幌子下，使美国资本更进一步地渗入拉丁美洲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加紧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压榨。

所有这一切，正如肯尼迪和腊斯克他们自己所招供的：美国对古巴除了大规模武装入侵以外，“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想像得到的行动”。当然，肯尼迪政府并不以这些行动为

满足。去年十二月一日，经常为美国政府现行政策辩护的《纽约时报》，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要摧毁它。肯尼迪政府拒绝在拉丁美洲容有一个共产党政府”。今年四月中旬，肯尼迪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回顾两年前那场“失败的入侵”时，也曾杀气腾腾地叫嚷说，他的政府在需要的时候，将像两年前那样，“毫不犹豫地在西半球采取主动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很明显，在反对古巴人民的革命和“铲除”古巴的革命政权这一方面，肯尼迪和基廷之流是没有半点分歧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环境下”进行侵略，两者之间有些不同看法：基廷之流叫嚷要立即对古巴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肯尼迪则更加阴险恶毒地主张“慢慢扼杀”。这就是肯尼迪所谓的“最明智的政策”。

为什么肯尼迪在侵略古巴的作法上同基廷之流会有不同呢？原来，一九六一年美国雇佣军在吉隆滩遭到的惨败，以及后来许多侵略活动的继续失败，使肯尼迪“从中获得了许多教训”，他不得不考虑在今后对古巴采取入侵行动时，怎样才不会再一次“处于丢脸的地位”。用肯尼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采取这种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必须考虑到这一行动在世界范围内“对我们自己处境的影响”；“在这样重要的一个问题上，应当把我们治病的药方（应读作侵略古巴的作法）开得更精确些”。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谋士李普曼，今年三月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曾经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美国直接“入



侵古巴，占领它，统治它”，这样做“代价将会是很高的，不仅人力财力所费不资，而且在全世界各地的影响上将会付出很高代价”。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罗手下的人都是骁勇善战的游击战士”，他们必然会回击美国的入侵，这样美国就“将陷入一场类似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经受的那种讨厌的战争”。同一个时候，肯尼迪政府的拉丁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马丁，在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拉丁美洲小组委员会报告时，给肯尼迪的所谓对美国的“处境的影响”也作了一个注脚。他说，如果美国对古巴实行军事入侵，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肯尼迪和他的谋士们清楚地知道，今天，美帝国主义正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美国的军队和基地遍布于世界各地，它的这种侵略行动，正在遭到世界各国人民愈来愈强烈的反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决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各国人民，都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对美帝国主义向古巴人民发动的任何侵略行动，决不会袖手旁观。特别是，长期遭受美帝国主义压迫和掠夺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他们同古巴人民一样有着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

自由的强烈愿望，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任何侵略，必然首先要激起拉丁美洲人民的强烈反应。这就是说，美帝国主义者担心它们入侵古巴之后，不但捞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自己淹死在古巴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汪洋



刽子手的“明智”

英 翥

——快，动手！

——傻瓜，我自有妙法！



洋大海之中，遭到老殖民主义者同样可悲的下场。因此，肯尼迪力图避免做出那种他认为“非常不明智的事情”，而居心险毒地策划更加毒辣、狡猾、更有欺骗性的所谓“明智的政策”。

如此看来，肯尼迪等人和基廷之流相互间的“分歧”，只不过是紧敲侵略古巴的锣鼓声中，发生了节拍不合的矛盾而已。他们的阶级本性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忠实奴僕，在加紧奴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这一基本目标上，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根本分歧。他们之间的争吵，只不过是一伙帝国主义杀人强盗之间关于如何杀人的争论。一些强盗心急如火，主张马上就动手杀人，而一些强盗则认为，杀人肯定是要杀的，但要杀得巧妙、有把握。这场强盗之间的争吵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在策划如何奴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问题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争吵，以便寻求最大限度地符合它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明智的政策”。但是，这场争吵却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肯尼迪所自诩的、并且为富布赖特之流所吹捧的对古巴的所谓“最明智的政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肯尼迪之流叫喊的所谓“明智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一种更狡猾、更毒辣、更阴险、更凶恶的反革命手段，就是要向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更疯狂的进攻。

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明智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明智”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明智只能有利于无

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任何一个阶级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从自己的队伍中选拔出最能代表本阶级利益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愈是能忠实而周到地为本阶级服务，他就愈能得到本阶级的赞赏，并被视为本阶级的明智的人物。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的明智，是对一切事物作出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判断，最深刻、最完满地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反动的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所谓明智，只不过是更恶毒、更狡猾地掠夺人民和奴役人民，更无耻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世界上决不可能有代表互相对立的两个不同阶级利益的“明智政策”，那种抽象的、超阶级的“明智”是根本不存在的。肯尼迪硬把他的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明智政策”，吹嘘成为不仅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符合西半球的“总的利益”，这完全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揭露帝国主义的这种欺骗伎俩，教育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鼓吹、宣扬帝国主义的这种“明智”，实际上就是帮助帝国主义欺骗人民。

日益觉醒的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决不会为美帝国主义的这种欺骗所迷惑。古巴人民的伟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说得好，对于肯尼迪之类的帝国主义者“是永远不能信任的”。帝国主义终究是帝国主义，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违背历史的潮流，顽固地抗拒人民的意志，反动到底，至死不悟。觉悟了的人民对于帝国主义决不抱有任何幻想。在觉悟了的人民面前，肯尼迪之流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这种所谓“明智的政策”，肯定是要失败的。



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虞挺英

我们的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始终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永远坚持共产主义的方向，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

为了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为坚强的革命后代，我们要进行许多工作，其中首先是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

在学校教师和家长中，有许多人对于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他们懂得，社会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地在我们的青少年的头脑里成长起来，因此，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十分重要。但是，也有一些教师和家长，往往有这样的想法：在社会主义环境里长大起来的青少年，不用操心也会具有社会主义思想，青少年单纯，不必特别加强政治教育，他们也可以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种想法，常常使他们忽视和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的青少年处在社会主义的好环境中，大量的新人新事，对他们有鼓舞、示范和启迪的作用；许多传播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艺术活动和出版物，对他们有积极的影响；健康的社会风气，对他们有很好的熏陶。这一切，使他们在耳濡目染当中，可以接受革命思想的感染，从而有助于社会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成长起来。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与旧社会相比，是“换了人间”。这种新的、好的社会环

境，对于青少年的接受真理，无疑是极其优越的。但是，好的环境影响还要加上人们自觉的教育工作，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收到更大的成效。环境的影响，毕竟不能代替有意识的教育工作。正像人们要成为高明的歌手，不能只靠音乐环境的熏陶，而必须经过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一样，人们要成为坚强的真正具有革命觉悟的人，也不能只靠革命环境的影响，而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切实的革命斗争的锻炼。我们的青少年总的说来，是有觉悟的，是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这正是生长在这个优越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好的影响，同时受到革命教育的结果。

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是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环境，是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环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和谁战胜谁的问题仍然存在。现在社会上还有剥削阶级的残余，还有坏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还有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等等。也就是说，还有不好的东西。所有这些虽然不占主流，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孔道，侵袭、勾引和腐蚀我们的青少年，对青少年发生极坏的影响。

为了说明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旧习惯



可以通过各种孔道影响青少年，这里举一个例。鲁迅在《朝花夕拾》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忆他的保姆长妈妈，说长妈妈懂得许多莫名其妙的道理，还有许多规矩，例如人死了，不说死掉，而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里，不应该走进去；晒裤子的竹竿底下，万万不可钻过去；等等。这位长妈妈所讲的，当然并不是一点合理的因素也没有，她也并不是有意地要向幼年的鲁迅灌输封建社会的旧思想、旧意识，但她本人的头脑里确有不少旧意识，而且认为这些都是很对的，她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些旧意识的传播人。这些旧思想、旧意识，也就经过“长妈妈”这样的“媒介”，对孩子们发生着影响。类似“长妈妈”这样的“媒介”，还可以是小说、戏文，或者是别的什么，它们可以在无形中影响青少年的思想意识。这种情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可以经常看到。生长在社会主义环境里的青少年，既可以大量地受到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受到旧思想、旧习惯的侵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的残余分子妄图复辟，不仅梦想着自己卷土重来，而且图谋在青少年中少数品质不好、思想堕落的人的身上，找到他们的未来的代理人。阶级敌人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往往突出地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如果我们放松了对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就难以保证他们中有些人不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及其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严重侵蚀，也难以保证他们中有些人不会由此走向政治上的堕落。

美帝国主义者早就透露出他们的一个阴谋，是妄图“和平演变”我们的后代。杜勒斯认为他们“鼓励”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演变”

的工作，“将在今后一、二代之后才产生效果”。纽约协和神学院教务长约翰·贝奈特露骨地说：“未来的希望不在于战胜俄国或中国的共产主义，而是在于共产主义的演变，这种演变将随着关心他们本身的建设更甚于思想意识或世界革命的新的一代而到来。”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是这样地“希望”，而且正在千方百计地进行各种活动，运用他们的邪恶的思想武器，直接或间接地渗透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来，以图实现他们的“希望”。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这个阶级斗争的环境中，我们对于青少年既不能让他们在温室中生长，变成经不起风吹雨打的弱花嫩草；也不能不加引导，不加帮助，采取所谓任他们到生活中去“撞一撞”的态度。我们应当让他们多接触好的东西，接受好的影响，同时，给予他们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使他们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辨是非，善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反动思想的侵袭，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我们要帮助他们努力提高觉悟，使他们沿着革命的轨道，通过知识的增长，经验的积累，实际斗争的锻炼，合乎规律地逐步由单纯走向成熟。

青少年单纯，较少沾染旧思想，热情活泼，对新鲜事物敏感，这对于他们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来说，当然是一个良好的条件。但是，由于青少年单纯，生活经验少，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阶级观念薄弱，分析和批判能力差，又往往难免幼稚；当着各种坏思想以比较复杂、隐蔽、狡猾的方式袭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比较不善于识别和抵制，而容易受到迷惑，容易上当。因此，从青少年单纯这个前提出发，所能得出的正确结



論，应当是要更好地关怀他們，从政治思想上保护他們和滋养他們，而决不能是相反。

实际上，由于认为青少年单纯，因而就忽略对于他們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关怀，是常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有些家长和教师有了这种思想，往往就对青少年馬馬虎虎，漫不经心，要求不严，不注意使新的健康的东西在他們身上巩固和发展起来，不注意克服他們身上的某些不良倾向的萌芽，不注意自己要用优良的思想作风給他們一个好的榜样，对他們采取了放纵的、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对于青少年的成长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然，针对着青少年单纯的特点，对他們进行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应当具有一些特点。例如，在政治思想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应当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适合青少年的各方面的状况，适合他們的理解水平，多多注意采用具体形象的方式，坚持正面教育，积极诱导启发，防止单调枯燥，等等。但是，这决不等于說，由于青少年单纯，就可以放棄或放松对他們的政治思想工作。

有些人盲目推崇青少年的单纯。认为人在幼年时期，是单纯的和天真的，这非常宝贵；后来，人长大了，就不单纯了，不天真了，变复杂了，这非常不好。为了保持那“非常可贵”的东西而排除那“非常不好”的东西，就要始終保持幼年时期的单纯。这种观点离开了阶级分析，籠统地认为“单纯”就好，“复杂”就坏，这是不正确的。

童稚时期的单纯，只是人們在一定时期的一种客观状态，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人們往后变得复杂起来了，如果这种复杂不是剝削阶级的那种思想复杂，而是知識和經驗丰富了，更善于以无产阶级的立場、观点和

方法思考和分析問題了，更有革命觉悟了，在革命斗争中更老练、更成熟了，那就不仅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地，却是很好的、应当努力追求的事情。

在我們看来，思想意识的单纯，同思想意识的纯洁，是有区别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是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武装头脑，不断地克服和清洗头脑中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积极成果。这种纯洁，是一种觉悟性的状态。例如我們說，我們的思想意识还不很纯洁，那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头脑里还残留着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杂质。我們要始終保持自己思想意识的纯洁，那意思就是說，我們要不断地清除自己思想意识中一切与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的东西，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革命品质。而思想意识的单纯，虽然是人們在一定时期所具有的一种状态，但它是一种多少不觉悟的状态。我們不应当盲目地推崇它，也不应当幻想永远保持它。我們要保持的，是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革命品质，而决不是什么童稚时期的思想单纯。如果一味赞赏那种不觉悟的单纯的状态，实际上就是阻止人們的革命觉悟、經驗和知識的成熟，使人們在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面前处于不设防的地位，以至由于这种侵蚀而造成思想混乱、思想混杂，直到思想上政治上的墮落。

总之，帮助我們的青少年在社会主义的斗争环境中健康地成长，使他們长大起来能够具有明辨是非的革命头脑，善于識別和抵抗一切反动思想的侵蚀，使他們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永远革命，永不变质，这是做教师的、做父母的所应当担负的重大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备問題

許 毅 戴 园 晨

后备的必要性和作用

有备方能无患，儲存可应急需。人們在再生产过程中，要从剩余产品中提留一部分产品儲存起来，作为后备。毛澤东同志早就說过：“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預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綫”^①。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备，是保证国民經济平衡发展和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困难的必要条件。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了生产資料的公有制，消灭了生产的盲目竞争和无政府状态，使国民經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是，人們的计划要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并不容易。毛澤东同志說：“……一般地說来，不論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②这就是說，计划的預期并不等于实际的发展。在执行国民經济计划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平衡現象。为了弥补计划的不足，应当采取各种积极措施，組織实现平衡。建立

和运用后备，正是組織实现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时指出，固定資本的价值逐步轉移到新产品上，固定資本的补偿基金不断积累，而固定資本实物形态的替换更新，却是在一定时期以后才进行。这就会产生当年形成的补偿基金，大于或者小于当年固定資本更新所需基金的不平衡現象。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形态一旦廢止，……这个情形，只能由不断的相对的过剩生产来救治；那就是，一方面必須有一定量的固定資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別一方面，并且特别是原料等物品的儲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生活資料方面說，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于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資料的控制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这种过剩是一个无政府的要素。”^③馬克思的这段話告訴我們，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把儲存后备作为“控制器”，多余則有计划地收儲，不足則有计划地动用，以解决再生

① 轉引自邓小平：《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預算草案的报告（摘要）》，1954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②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2頁。

③ 《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5—586頁。



产过程中固定資產替換更新所必然出現的不平衡現象。

在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不平衡的因素。例如，作为国民經济基础的农业，在沒有实现现代化以前，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不够强大，風調雨順能获丰收，水旱風雹則遭災歉。一旦农业歉收，就可能影响生产建設和人民生活。在工业和国民經济其他部門，也不可能完全保证不发生意外。山洪可能冲毀铁路，瓦斯爆炸会使矿山生产暫時停頓。在經济活动中，企业之間和部門之間也难免发生或大或小的脫节。由于社会主义計划經济环环相扣、紧密相联，局部的意外和脫节，都会影响国民經济的平衡发展。对外貿易是社会主义經济活动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間要进行經济上的互助合作，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也要做生意。对外貿易的发展变化，并不完全取决于我們，別国的政治經济形势的变动，会引起貿易关系的建立或中斷，会导致交易活跃或购銷呆滯。这种情况，也会对国民經济的平衡有所影响。以上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国民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計划地来組織实现平衡，而后备，正是組織实现平衡的物质力量。

后备，不仅是保证国民經济平衡发展和再生产順利进行的不可缺少的物质力量，而且是应付战争这种突然事变所必需的。大家知道，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沒有消灭帝国主义制度以前，战争危險总是存在的。美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陣营周圍到处建立軍事基地，严重地威胁着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帝国主义至今还霸占着

我国的領土台灣，并且不时地向我国进行軍事挑衅。所以，我們不能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也就不能不建立后备，儲备必要的战略物資。

需要建立哪些后备

为了調节国民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应付某些重大的意外事件的需要，我們要从多方面来建立后备。既要有物資后备、財政后备，还要有矿山資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既要有全国性的后备，还要有地方性的后备，以及集体所有制經济单位的后备。这样，就可以在不同方面适应不同的需要，并且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后备防綫。

关于物資后备。保证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后备力量，在于儲存各种必要的物資。所以，人們談論后备，通常总是指物資后备。为了应付天災和其他重大意外事故，我們需要有粮食和主要的日用消費品等生活資料的后备；为了保持生产建設发展过程中的平衡，我們需要有各种器材和原料、材料等生产資料的后备；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我們需要有战略物資的后备。只有儲备了这些后备物資，才能使再生产的持續进行和人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人說，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有人說，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再生产的持續进行，从而认为只需要生活資料的后备，或者只需要生产資料的后备。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使再生产持續进行，人民生活的需要才能得到保障；只有人民生活的需



要得到保障，再生产才能持续进行。因此，既要有生活资料的后备，又要有生产资料的后备，两者不能偏废。

后备，通常是指长期后备。因为，一旦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等意外事件，很难以当年积贮的资源来弥补，这就需要有计划地逐步地积累一定数量的长期后备。同时，为了调剂盈亏，应付某些局部的自然灾害，保证年度、季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及时弥补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局部脱节，在年度计划中往往要留下一定数量的物资。比如，年度物资技术分配计划中就列有当年准备，它是长期后备的缓冲力量，使长期后备不致被局部的偶然事件所冲击，不致被周转调度的需要所挪用，从而巩固和增强长期后备所能起的作用。

我国的物资后备，主要由国家来储备，并且指定不同部门采取不同的办法来管理。国家物资储备部门是执行长期储备任务的机构，它根据国家计划规定的品种、数量，收储各种重要物资。国家储备，必须经过国家批准，才能动用。至于国家计划规定的钢铁等生产资料的当年储备，以及国家允许的超产收储等，由物资供应部门来收储和管理，并且根据国家计划动用。另外，粮食和其他消费品的储备、工业用的经济作物的储备，则由国营商业和粮食部门担负。

在我国，不仅要有全国性的物资后备，而且在国家计划的统一安排下，地方也要有一定的物资后备，以便及时弥补局部性的不平衡，保证地区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执行。同时，不仅要有全民所有制的后备，而且要有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后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要注意节约，逐步积累起粮食等

物资后备，这是逐步富裕之道，也是应付灾祸和意外的力量。我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基础薄弱，充分动员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建立起必要的后备。

关于财政后备。资金是物资的货币表现，财政后备是物资后备的资金来源。建立物资后备，必须有相应的财政后备，财政后备通常又表现为相应的物资后备。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单位所建立的粮食等物资后备，是自己生产的果实，不需要财政后备作为资金来源。在国家的财政后备中，往往有一部分是国家银行储存的外汇，以及黄金这种特殊的财政物资，这又是独立的财政后备。一定数量的黄金和外汇后备，是我们对外贸易支付结算的机动力量。黄金和外汇后备，同其他各种用财政后备建立起来的物资后备一样，也是极其重要的。

在我国，有着各种不同形式的财政后备。由于财政后备和物资后备密不可分，有计划地建立国家的物资后备，必须通过国家财政有计划地分配后备资金。国家的长期物资后备，就是通过分配国家预算的储备资金和安排国家预算的结余资金来建立的。国家预算的储备资金，是国家预算分配用于建立国家储备的资金，是国家的主要后备力量。国家预算的结余资金，是以上年度预算执行中由于增产节约，收入超过支出而节省下来的资金，它作为金库存款存放在国家银行，是国家财政后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备还不充足的情况下，增产节约而结余的资金，应该是补充后备的资金来源，一般不宜再动用。至于国家预算的预备费和周转金，则存放在国家银行，通过银行信贷，成为年度物资技术



分配计划中当年准备等的资金来源。这些不同形式的财政后备，既各自适应不同的需要，又相互联系、互为补充，都是国家财政后备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财政后备同物资后备一样，也应该既有全国性的，又有地方性的。地方预算需要有预备费和周转金，而地方预算的结余资金，也是地方性财政后备的一个方面。地方性的财政后备，为地方建立物资后备提供相应的资金来源。

除了物资后备和财政后备以外，还要有矿山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在再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设备难免不因意外事故而遭受损失；矿山资源的普查勘探、矿山建设、生产能力的建设，又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就要在事先作出安排，建立相应的后备，特别是对某些牵涉面广的企业和部门更加必要。这种后备并不采取生活资料和钢铁等原料、材料的形态，而是经过普查勘探和矿山、企业的基本建设等过程，把生活资料和各种原料、材料转化为矿山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这种后备所需要的资金，来自国家财政的基本建设投资和经济建设事业费，而不是来自国家财政的后备资金。所以，我们通过资金分配来有计划地安排后备力量的时候，还要考虑到建设资金中用于建立矿山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后备的比例，做到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为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组织国民经济的平衡，创造有利条件。

后备同周转、积压的区分

组织后备力量，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区分

后备物资同周转、积压物资的差别，划清后备资金和流动资金的界线。

后备物资和周转物资，都是生产物的储存；后备资金和流动资金，都是生产物储存的货币表现。但是，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后备物资和后备资金是为再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有所准备，周转物资和流动资金则是正常的生产和流通所必需。工业企业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要有一定数量的原料、材料和燃料等物资储备；商业企业为了保证商品流转和商品供应，要有一定数量的商品储备；交通运输业、建筑业以及服务业，也要有经营活动所必需的储备。这些企业的周转物资和相应的流动资金，是企业进行经营活动、实现国家计划所不可缺少的。我们不能把流动资金当作后备资金来使用，否则，就会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的流转。

后备和积压，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工业企业盲目采购原料、材料，或者盲目生产了一些社会所不需要的产品，商业企业盲目收购了一些不适销的物资，这些都是积压，而不能视为后备。因为盲目采购或者盲目生产所积压的物资，通常是品种过时、质量低劣，为社会所不需，或者是数量远远超过社会的正常需要。所以，积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物资和资金的浪费，我们不能把不合理的积压当作后备来看待。工业企业在生产中，必须按照国家计划采购原料、材料，生产产品，重视产品的质量，关心产品的规格、品种，防止积压；企业必须加强经济核算，合理地使用流动资金。承担储存后备任务的部门，在收储产品、积累后备的时候，也不能把盲



目生产的积压物资，当作后备收储起来。否则，不仅不能起积累后备的作用，反而会掩盖工作中的缺点。

后备资金不是流动资金，更不是因积压而多占了的流动资金，我们必须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除了国家储备之外，后备资金和流动资金又有相互联系的一面。国营商业、粮食和物资供应部门，担负着商品流转和商品供应的任务，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周转物资储备和相应的流动资金。同时，物资供应部门和国营商业、粮食部门的采购供应单位，又有储存后备的任务，有相应的后备资金。两者是统一管理的。在物资储备中，为了不致因储存而使物资变质，品种过时，就必须在控制库存量的条件下，推陈储新，进行有计划的替换。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对周转物资和后备物资是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的，具体到一件物资，则不易区分它是用于后备还是用于周转。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便混淆了后备和周转的界线，以致把后备当作周转中的积压，或者把周转中的积压当成后备。

流动资金和后备资金的联系，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两者都是储存的物资及相应的资金。由于社会储存的物资总有一定的数量，国家财政和银行信贷供应的资金也相应地有一定的数量，因此，流动资金数量的增减，就会影响到用于后备资金数量的增减。企业管理不善，积压多，占用了超过正常周转需要的流动资金，就会减少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用于后备的资金；如果企业精打细算，在保证正常生产和正常流通的条件下，节约了流动资金，则有可能把节省下来的资

金，通过国家财政和国家银行的资金再分配，用于建立国营商业、粮食等部门的后备。周转储备是否合理，流动资金占用多寡，同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密切相关。所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节约流动资金，有利于增强后备力量。而针对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盲目积压增多的情况，采取清理仓库、核定资金和处理积压等挖掘潜力的措施，能够取得增加后备的效果。

正确建立和运用后备

正确建立后备和运用后备，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积累必要的资金，来积极支持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只有生产建设事业发展了，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和积累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就必须正确处理当前生产建设同积累后备的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强调当前生产建设的资金需要，而忽视后备的积累。因为，后备归根到底也是发展生产建设所必需的物资和资金。从较长的时期来看，保留适量的后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不是阻滞而是加速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也不能以为后备愈多愈好。不必要地保留过多的后备，使资金和物资不能充分利用，那就会影响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对后备要留之有度，对建设事业支出要用之有节，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正确处理留有后备同当前生产建设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于合理安排后备的数量界限。我们可以从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



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連續遭災的可能性等方面，来考虑粮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儲备数量；我們可以从工业生产計划管理的水平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来考虑器材、原料、材料和各种工业品的儲备数量；我們也可以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来考虑战略物資的儲备数量。但是，由于在生产建設过程中，各方面都迫切需要資金，因此，作为长远目标的后备的建立，不能一蹴而就，必須逐步积累。这样，各个年度保留后备的数量多大，就更加紧密地关系到年度用于发展生产建設事业的物資和資金的數額。由于各个年度年景不同，生产发展速度不同，財政資金收入多寡不同，这就要求我們必須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后备和用于当前生产建設資金的比例和数量。我們要在农业丰收、生产增长和財源充裕的时候，适当地多留一些后备，做到“丰年不奢”。我国国家大、底子薄，积累后备的出路在于勤儉。勤足以开源，儉足以节流。勤儉建国、勤儉办企业事业、勤儉办社、勤儉持家，是我們国家和人民逐步富裕起来的根本之道，也是我国积累后备的根本之道。

动用后备，要有計划，要有控制。为当年計划的执行而准备的物資和資金，也具有后备的意义。在預算执行中发生了追加支出的需要，便要动用預备費；在物資技术分配計划执行中，由于預算的追加支出，或者由于計划安排不足，由于新技术的采用，由于增产，发生了追加分配的需要，便动用物資的当年准备。而后备通常是防备重大事变、为年度間的調剂而准备的，它必須同当年准备有所区分，严加控制。它的动用应当

是以丰补歉，而不是以歉补丰。农业生产发生重大災歉，工业生产受到某些不利因素影响而减产，国民經济发展过程中出現不协调现象的时候，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才需要动用后备。在需要动用后备的时候，仍旧一味积累后备，固然不适时宜；在物資丰裕和財源充沛的时候，不注意后备的积累甚至动用后备，也是不适宜的。所以，动用后备應該有計划、有节制，动用以后，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有計划地补足。同时，后备的作用在于保障生产的順利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至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的物資，則必須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能采取动用后备、减少庫存的办法来解决。

动用后备，在于动用后备的物資来满足需要。由于物資后备和財政后备密不可分，建立物資后备，要有財政后备提供資金来源；物資后备的动用，也要以相应的財政后备資金的分配使用为前提。所以，动用后备还必须根据动用的目的，通过国家預算作相应的安排，并且要組織国家預算、銀行信貸和物資供需的平衡。如果动用的是国家物資儲备部門的物資，必須有計划地收回这部分物資所占用的国家預算的儲备資金；如果动用的是国营商业和粮食等部門的物資后备，那末，由于国营商业和粮食等部門的后备資金来自銀行貸款，就要通过对国家預算結余資金的安排使用，减少金庫存款，压缩銀行对这些部門的貸款。这样，把后备物資的动用，和用于这些物資儲备的資金再分配結合起来，有計划地組織資金和物資的平衡，就能够消除运用后备的盲目性，促进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地发展。



批判資產階級社會學在階級 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謬論

· 庄 福 齡 ·

在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上，歷來就表現了無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對立。資產階級從來沒有正確地說清楚社會上為什麼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當它由上升走向反動的時候，就竭力掩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矛盾。作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社會學，集中地反映了這種觀點，而成為現代資產階級對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思想武器。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人孔德（1798—1857）創立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當時，一方面，西歐資產階級開始走向反動，資本主義的危機日益迫近；另一方面，工人運動迅速地發展起來，新興的革命無產階級要求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社會學的使命就是力圖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反對革命，敵視真理，用偽科學欺騙人民。自從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後，資產階級社會學一直同馬克思主義處於根本對立的地位，正如馬克思所說：“我身為黨員，是同孔德主義勢不兩立的，而作為一個學者，我對它的評價也很低。”^①

資產階級社會學歷來就集中力量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宣揚階級合作。由於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事實，任何人要想抹殺也抹殺不

掉。因此，資產階級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的攻擊，常常不是直接地否認社會上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事實，而是在劃分階級的标准問題上製造混亂，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狀況作種種歪曲的描述。

有些資產階級社會學家片面地從分配關係方面對社會階級妄加解釋，他們把收入來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作為劃分階級的标准。按照這種論調，同一階級的人是因為有着相同的收入來源，工人階級所以是工人階級，是因為他們領取工資，資產階級所以是資產階級，是因為他們獲取利潤；或者同等數量收入的人就是同一階級，收入多的是一種階級，收入少的又是一種階級。“分配論”就是把分配上的差別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把它作為劃分階級的标准。

馬克思主義指出，人們在分配領域中的差異，是從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係及其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不同而產生的，階級劃分的根本原因不是產品的分配方式，而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列寧說：“從收入來源尋找社會不同階級的基本特徵，這就是把分配關

^① 《馬克思致愛·斯·比斯利》，《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91頁。



系放在首位，而分配关系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結果。”^① 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区别，不仅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間，而且也存在于同一阶级内部。用这种方法来划分阶级，并没有揭示阶级的本质，不能把不同的阶级区分开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由于不占有生产资料，只好出卖劳动力，依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只不过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轉化形态，它掩盖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之間的对立，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剝削。资本家所以能获取利潤，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占有了生产资料，剝削工人阶级而得来的。这种利潤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所創造的剩余价值的轉化的具体形态，是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硬把划分阶级的标准說成是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的不同，无非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

“分配論”力图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的道路，不去触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不去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仅仅去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争取分配方面的某些改良。馬克思早就揭露了“分配論”对于工人阶级革命意志的腐蝕作用，他指出，工人阶级“不应当忘記：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反对着后果，而不是反对着产生这种后果的原因；它不过是阻撓着这种恶化其生活状况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它只是在采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鏟除病根。”^②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还大肆宣揚所謂

“組織論”。这种論調就是把人們在社会生产組織中职能上的差異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种不同的阶级，一种是生产的組織者，另一种是生产的执行者。在他们看来，资本家在生产中起着“組織者”的作用，应该居于統治的地位；而工人阶级在生产中則起着“执行者”的作用，应该处于被統治的地位。“組織論”者认为，社会上要进行生产，一定要有不同的阶级在生产中执行不同的职能，就像动物軀体有各种不同的器官一样。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上阶级的存在和保持不平等的分工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戴維斯和穆尔說：“社会不平等是无意識地一代一代地傳下来的手段，借着这种手段，社会才能保障最有能力的人忠誠地占据最重要的地位。”^③ 西德的资产阶级学者海因利希·馮·斯塔克尔堡甚至无耻地說：“在我們的经济制度下，如果没有资本家，一切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就要餓死和冻死。”^④

这种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剝削制度辯护的謬論，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在生产組織中的作用确实有所不同。资本家在生产中能起組織作用，在经济上占据統治地位，是因为他们占有生产资料。

① 《社会革命党人所复活的庸俗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3頁。

② 《工資、价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版，第426頁。

③ 戴維斯、穆尔：《阶层若干原則》。

④ 海因利希·馮·斯塔克尔堡：《国民经济学理論基础》。



正如馬克思指出：“資本家是資本家，不是因为他是在产业上的指导者；乃因为他已經是在資本家，所以成为产业上的命令者。在封建时代，軍事上訴訟上的裁決权，是土地所有权的屬性；同样，产业上的命令权，也成了資本的屬性。”^①工人階級由于不占有生产資料，就不可能在生产上居于統治地位，發揮組織者的作用。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不同作用，是由資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并不是如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所說的是一种“天賦的职能”，这种不同作用是可以改变的。随着資本主义制度的消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工人階級掌握了生产資料，他們就能在生产中起领导和組織的作用，而資本家在資本主义社会的那种作用也就完結了。

现实生活也表明，資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随着股份公司广泛的发展，資本家日益脱离生产組織和管理，他們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不断增长，依靠“剪息票”和債券收入为生的食利者阶层愈来愈多。据統計，一九六〇年美国食利者的收入总共为四百零八亿美元，超过了拥有四亿多人口的印度的全部国民收入。現在資本家在生产中逐漸失去作用，已經成为生产发展的障碍物。

此外，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还把文化程度的高低作为划分階級的根据，认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們組成了不同的階級，說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屬於社会的“高等階級”，而沒有文化的劳动人民則屬於社会的“下层階級”。他們认为劳动人民只要提高文化就可以改变階級地位。还有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竟荒謬地把許多毫不相干的因素，例如职

业种类、收入来源、家庭經濟的类型和住宅等，折衷地拼湊在一起，构成所謂划分階級的“社会地位特征指数”，通过計算“指数”的高低来确定人們的階級地位。

資產階級社会学家不但矢口否认划分階級的客观标准，歪曲社会上产生階級的原因，而且大肆宣揚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关系已經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階級之間的界限在日益消失。联合国科学、文化及教育組織社会科学部主任特·恩·馬歇爾說：“社会階級”一詞已經“过时”了，因为“現在已經不存在具有共同經濟利益的集团”^②。另一个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捷西·貝尔納德說：階級是“貧穷的时代”所特有的，而現代資本主义是处于“富裕的时代”，报酬、教育与就业等方面的差別消失了，它正在向“平等”的和“无階級”的社会方向发展，因此，“資產階級”与“无產階級”的概念已經沒有什么用处了^③。他們还編造了許多謊言，提出什么“技术决定論”、“社会流动論”、“中間階級論”等等，妄图粉飾資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掩盖資本主义社会的階級斗争日益尖銳化的事实。

“技术决定論”认为，由于現代技术的发展，資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資本家不再起决定作用了，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知識分子和技术专家。資本主义社会将变成“管理者社会”、“經理社会”。美国“技术决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8頁。

② 見特·恩·馬歇爾《二十世紀中社会成层的变化概况》。

③ 參見捷西·貝尔納德《在富裕的时代中的階級組織：階級組織的新原則》。



定論”者伯恩汉說：“由于生产技术的变化，管理职能在全部生产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了，因而就使得执行这些职能的人成了社会的领导集团或阶级”^①。美国社会学家埃列斯柯并赋予这个社会以“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称号。他說，在这样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理性”成为資本，“理性”的所有者就是掌握技术的管理者、工程师等。某些“技术决定論”者有时也提到资本主义社会有“弊病”，这就是資本家在技术和組織方面的不学无术，不善于管理企业。他們說，只要資本家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給技术知識分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就可以消除。

其实，技术是人們在从事物质資料生产的过程中創造出来的，并为人們所掌握和支配，离开了人，技术便是死东西。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有着巨大的作用，技术的进步促进生产的发展。但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出現，决不能根本改变社会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改变，都是由于阶级斗争发展的結果，而不是技术发展的結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資本家掌握着生产資料的所有权，整个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因此，技术在資本家手里，只能是剝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列宁說：“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技术和科学的进步意味着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②这种进步絲毫不会触及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礎，当然更談不到消灭资本主义的剝削和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結構了。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归结为資本家不懂得技术，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胡謔。资本主义的弊病根源

于资本主义剝削制度。这种弊病只有推翻了資本家統治，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根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即使資本家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給了技术知識分子，这不过是由資本家的一只手里轉到另一只手里，即資本家代理人的手里。資本家仍然掌握着实际权力。技术知識分子是以資本家的意志为轉移的，决不能独立行事。正如斯大林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工程师、生产組織者并不是按照自己所願望的那样去工作，而是按照別人所命令他的、按照主人的利益所指令的那样去工作。”^③

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社会学学会議上，許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提出了所謂“社会流动論”。他們說，在現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們在社会阶级、阶层之間是經常流动的，特别是从低的阶层向高的阶层、从一些社会集团向另一些社会集团流动。他們认为，高度的流动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主要特点。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庫尔特·梅耶尔說：“在美国这个大国里一切有才干的人和野心家不論他們是什么社会出身都有充分的机会‘飞黄騰达’。”^④他們把资本主义社会說成是“阶级开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对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提供向上层阶级流动的机会。他們还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經濟机构、政治机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

① 伯恩汉：《管理革命論》。

② 《榨取血汗的“科学”制度》。《列宁全集》第18卷，第594—595頁。

③ 《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頁。

④ 庫尔特·梅耶尔：《最近美国阶级結構的变化》。



度等等，說成是“社会流动”的阶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姆·李普希特等說，社会所需要的官吏的总数“久而久之是要增加的”，“上层阶级”的人口常常不能保证“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下层阶级”就可能向“上层阶级”流动，而“填满空缺”^①。他们还說什么劳动人民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购买股票、获取利润、参与企业管理，从而逐步地登上百万富翁的宝座；也可以通过议会选举而获得高官厚爵；还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跃入社会的上层；甚至可以通过同百万富翁或百万富孀結婚的机会而接受优厚的遗产；等等。請看，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描绘的一幅“社会流动”及其种种“渠道”的美妙的图画。

“社会流动論”企图在劳动群众面前臆造一个“海市蜃楼”式的幻境，仿佛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对任何人的发财致富設置障碍，今天一无所有的貧民，明天可以成为百万富翁，阶级矛盾和阶级界限都会在这种“高度流动”的社会里自行消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早已拆穿了这种騙人的謊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宣揚的那样的“社会流动”；恰恰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規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不断地发生阶级分化，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在广大小生产者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人爬上了剝削阶级的地位，变成了资产阶级；而絕大多数人則日益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排挤，陷于饥饿和破产的境地，不断地补充着无产阶级的队伍。据今年二月十四日美国《国民前衛》周报的一篇文章說，美国由于大批小农场遭到排挤和吞并，近十年来，每年平均有一百

万农民被迫离开农业，流入城市。无产阶级由于遭受资本家的殘酷剝削，工資的比重不断下降，生活日益貧苦，而且常常要遭到失业的灾难；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比重則不断提高，社会财富愈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中。例如，在西德，工业生产中的工資在新創造的价值中的比重，从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四十七下降到一九五六年的百分之三十三；而剩余价值率一九三六年为百分之一百四十八，一九五〇年为百分之一百八十七，一九五五年則高达百分之二百零四。在这种“人吃人”的社会里，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地走向饥寒交迫的境地，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下层阶级”向“上层阶级”流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机构和制度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是剝削和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是套在劳动人民頸上的枷鎖。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持有股票只是极少数，而且往往是被强迫购买的，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资本家强迫工人购买股票是为了麻痹工人阶级意識，模糊阶级界限，使他們丧失革命斗志。资产阶级的議会是統治和欺騙人民的工具，资产阶级的选举，只不过是几年一次地解决統治阶级内部誰来执政的問題，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权利是被剝夺了的。至于资产阶级的教育，也不过是培养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奴才。总之，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机构和制度都是根据资本家利益需要而設置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对于劳动人民

① 参見斯·姆·李普希特、格·澤捷尔别尔格《社会流动理論》。



說来，决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只会带来极其悲惨的后果。

同上述“社会流动論”相呼应，资产阶级社会学还虚构了所謂“中間階級論”，他們几乎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階級和阶层都划入了“中間階級”。在他們看来，“中間階級”既包括企业主、农場主、銀行家、官僚、經理，也包括教員、職員、售貨員、技师、医生、小店主、熟练工人等等。他們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中間階級”不断扩大的过程。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庫尔特·梅耶尔說：“如果这种趋势保存下去，那末美国社会就其階級結構而言，将在最近重新变成一个中产階級占优势的社会。”^①

资本主义社会真是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所說的是“中間階級”占优势的社会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階級結構表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这个社会的基本階級，与基本階級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非基本階級，这些階級都具有各自的特点，絕不是一个統一的“中間階級”。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場主、企业主、銀行家、官僚、經理等等，有些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有些則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們共同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确实有一批人数众多的小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職員、技术人員、知識分子等，由于經濟上和政治上各不相同，他們并不是属于同一階級，更不是什么統一的“中間階級”，而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中間地位。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还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知識分子有所增加的情况，为他們的“中間

階級”不断增加、階級矛盾日益泯灭的論点作論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識分子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階級，他們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例如，生产部門的管理人員和技术人員不仅执行了工艺过程的领导职能，而且执行了监督工人的职能；其他部門的知識分子也都是从不同的方面为资产阶级統治服务的。怎么能够說，资本主义社会知識分子的增长会引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不断减少、階級矛盾的逐步泯灭呢？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捏造了上述騙人的謬論，来攻击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階級和階級斗争的事实，企图从精神上毒化劳动人民，抵制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他們不要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资产阶级社会学很得到帝国主义的賞識。美帝国主义就曾积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推行资产阶级社会学，借以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窒息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解放前的中国就是一个例子。那时由美帝国主义培植起来一批文化奴僕，就曾大力販卖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破烂貨色，反对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理論，反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有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公然认为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階級的标准是主观捏造的。他說：“近来有許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往往把一两个單純的抽象观念来做标准，而分社会做种种階級，以为人們在社会上的冲突实在因为这种階級观念而生的。有的社会科学家以生产方法为

^① 庫尔特·梅耶尔：《最近美国階級結構的变化》。



标准而分社会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殊不知这些标准都是抽象的，都是分类的人的主观的见解，不是社会里面实在是这样分的。”^①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也宣扬所谓“阶级流动论”，认为资产阶级可以变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可以变为资产阶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彻底地粉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种种谎言。可是，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影响在中国就绝迹了。我们看到，在一九五七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向中国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一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就曾企图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用以对抗马克思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思想武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不放松对中国人民的进攻，企图夺回它失去的理论阵地，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历来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就从资产阶级社会学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当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股份公司的时候，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发生变化，他说：“在工业中到处都发生着同样的过程，非个人的所有制形式逐步增加了。就是在那些最初是由一个人创办的企业中，就是在那些企业中，所有权也是一代比一代更加分散，最初是在创业人的家庭内部分割，但是以后随着企业的不断扩大，也把股份转让给外人。”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说不上有什么鸿沟”^②。叛徒考茨基曾散布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日益缓和的思想，他说：“工人在资本主义之下得

到的福利越增长，他们就越安于并容忍资本主义制度，就越放弃一切不可靠的冒险企图。阶级矛盾的日益缓和正是随着无产阶级越强大而把社会主义推向越遥远的未来。”^③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更为明显。他们编著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公然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说，这种阶级关系更加改变了”。这本书说：工人由于参与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那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分配，“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当作劳动力价格的工资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再是旧的、对资本主义具有典型意义的雇佣劳动关系。”^④现代修正主义者还把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矛盾说成是人类与核武器的矛盾，认为核武器的出现，各阶级之间已没有利害冲突了，它们的利益趋于一致了。可见，修正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方面，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的。

从上述可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谬论，揭露它的反科学、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对于提高劳动人民的识别能力，加强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郭任远：《社会科学概论》。

② 见伯恩斯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

③ 考茨基：《唯物史观》第2卷。

④ 见米尔科·贝洛维奇《政治经济学》第4篇。



列宁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

郑言实编

八 反对社会沙文主义

社会沙文主义者帮助反动派驱使各国工人互相厮杀

酝酿已久的世界大战，终于在一九一四年七月底爆发了。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同盟国和协约国）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

战争是帝国主义矛盾的总爆发，又使这些矛盾更加尖锐化。战争同时也揭破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脓疮，撕去了隐藏在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叛徒的假面具。各交战国家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集团，在战争一开始就背叛了斯图加特大会、哥本哈根大会的决议和巴塞尔宣言，公然投向资产阶级怀抱，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声明叫嚷“俄国入侵”，宣称“在危险时刻我们不会抛弃祖国”。党的右派领袖谢德曼说：“我们有责任保卫社会民主主义最发达的这个国家，使它免遭俄国的奴役。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因为我们参加了社会党国际而不再成为德国人了。”工会总委员会宣布“国内和平”，号召工人在战争中支持政府。议会党团领袖哈阿兹说，战争对德国来说是防御性的，因此每一个德国人都应该保卫祖国，同时，德国在这次战争中还要为俄罗斯人民“争取自由”。社会民主党不但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而且还派人到前线去“激励”士气。

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也发表全力支持政府的声明，号召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反对沙皇俄国和半野蛮的塞尔维亚”。

在法国，社会党声明必须保卫法兰西，抗击德国人的侵略，并到处宣传法国进行的战争是防御性的、正义的。议会党团同样也投票赞成本国的军事预算。党的两个代表盖得和桑巴加入了帝国主义政府，以保证工人和资产阶级在战争中的“合作”。



英国社会党右翼，俄国孟什维克，比利时社会党领袖（包括身为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的王德威尔得），都支持本国政府对德国作战。

有些社会党人不仅在国内散布沙文主义，而且在国外到处游说。德国社会党人谢德曼、列金等受政府委托，到瑞士、瑞典、丹麦等中立国家，劝说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和社会舆论赞助德国。英、法的社会党人跑到俄国，鼓动俄国工人为保护沙皇制度和它的盟国而战。

第二国际的大多数领袖既然已经公开背叛了社会主义，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个国际就完全破产了。在分裂国际工人运动，促使第二国际破产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罪魁。列宁说：“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最有威信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负玷污社会主义的责任。”①

维护巴塞尔宣言，揭穿“保卫祖国”口号的反动实质

在历史发展的这个紧要关头，在各国社会党陷于深刻危机、工人运动领袖纷纷叛变的情况下，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毫不犹豫地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团结革命的社会党人，领导劳动群众，坚定地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前进。

战争爆发后，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列宁从奥地利移居到中立国瑞士。列宁一到达瑞士的伯尔尼，立即起草了一个关于战争的提纲，即《革命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大战中的任务》。在这个提纲里，列宁回答了当时最迫切的基本问题，向全世界革命群众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在得到俄国国内党组织的赞同以后，列宁把这个提纲改写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题为《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在整个大战期间，这个宣言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彻底揭露了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尖锐地谴责了欧洲各主要国家社会党领袖的叛变行为，并且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当遵循的唯一正确的斗争路线。宣言说：“强占土地和征服异族；打垮竞争的国家，掠夺它的财富；使劳动群众不去注意俄、德、英等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分裂并以民族主义愚弄工人，迫害他们的先锋队，以削弱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现时战争的唯一真实内容和意义。”② 宣言号召使沙皇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并指出：“变现时的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这个口号由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提示，由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所规定，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条件中产生出来的。”③

①②③ 《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2、10、16页。



一九一五年二月，英、法、比等協約国的社会党人在倫敦召开了代表會議，同年四月，德、奧等同盟国的社会党人在維也納召开了代表會議。双方都假惺惺地呼吁各国政府建立和平，帮助資产階級安撫群众，并为自己的沙文主义立場辯护。布尔什維克派李維諾夫出席了倫敦的會議，在会上宣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宣言。會議主席采取卑劣的手段，几次打断李維諾夫的发言，李維諾夫就退出了會議。列宁說，“对于倫敦代表會議上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人來說，任务很清楚，就是退出这个會議以捍卫鮮明的反沙文主义的原則，同时不陷入亲德主义。”^①因为亲德主义者也反对倫敦會議。

列宁斥責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巴塞尔宣言的背叛，指出他們“不敢否认巴塞尔宣言，也不敢拿这个宣言提出的要求同各国社会党在战时的行为相对照”。“有人竟完全避开巴塞尔宣言或避开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而援引領袖們的言論或个别党的決議，这种伪善态度是极其令人憤慨的，因为第一、这些言論是在巴塞尔大会以前发表的；第二、这些決議并不是由世界各国党共同通过的決議；第三、这都是針對各种可能的战争，而不是針對当前这场战争說的。”^②

列宁說，巴塞尔宣言“既沒有一个字談到保卫祖国，也沒有一个字談到进攻战和防御战的區別，……宣言十分明确地认为这次战争具有掠夺的、帝国主义的、反动的和奴役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得保卫祖国的思想成了理論上毫无意思的、实践上荒謬怪誕的东西”^③。列宁同时也指出，馬克思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保卫祖国”的口号，它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保卫祖国”或“防御”战争的合理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他說：假如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等等，那末“不管誰先进攻，这些战争都是‘正义的’、‘防御的’战争，而一切社会党人都会同情被压迫的、附屬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希望它們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④。但是，社会沙文主义者主張“保卫祖国”，决不是为反对異族压迫，而是为了捍卫这些或者那些“大”国掠夺殖民地或压迫異族人民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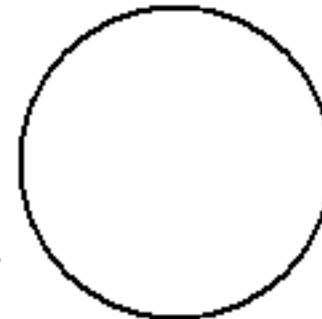
社会沙文主义是社会党内熟透了的資产階級膿疮

在《第二国际的破产》、《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等著作中，列宁对社会沙文主义作了透彻的分析，指出机会主义怎样在几十年間逐渐从各国社会民主党內成熟起来，并且轉为社会沙文主义。

① 《談倫敦代表會議》。《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6頁。

②③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2卷，第99、101、99—100頁。

④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0—281頁。



列宁写道：“所谓社会沙文主义，我们是指在当前帝国主义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的思想，为社会党人在这次战争中同‘本国’资产阶级和政府的联合辩护，拒绝宣传和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等等。”^①

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条件下的具体表现，它们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内容，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战争使这个思想发展到了顶点，并且把它的一系列特别的因素和刺激附加到一般的因素和刺激之中，用特殊的威胁和暴力迫使平庸的分散的群众同资产阶级实行合作：这种情况自然使拥护机会主义的人日益增多，这种情况也充分说明为什么许多昨天的激进派投入这个阵营。”^②

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是一个，“那就是很小的特权工人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人捍卫自己的特权地位，捍卫从‘他们的’民族资产阶级靠掠夺异族、靠大国优越地位等而攫取的利润中分一点油水的‘权利’”^③。

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④“社会沙文主义是米勒兰主义、伯恩斯坦主义、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直接继续和完成，是它们的总和，它们的总结，它们的结果。”^⑤

九 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

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中间，除了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之外，还有一个所谓“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的主要代表考茨基是“彻底毁坏马克思主义、毫无气节、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就非常可鄙地动摇和叛变的典型”^⑥。但是，他在第二国际中负有很高声望；同时，他的伪善面目又有很大欺骗作用。因此，同考茨基作斗争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当时一个关系全局的根本的问题。为了把各国革命的社会党人和广大群众团结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在大战期间，用很大的力量来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一九一四年十月列宁在一封信中写道：“对无产阶级的思想独立来说，目前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考茨基的这种丑恶的自鸣得意和卑劣的伪善态度更有害和更危险的了，他想蒙蔽一切和掩盖一切，想用诡辩和似乎是博学

^{①②④}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8—219、219、220页。

^③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9页。

^⑤ 《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422页。

^⑥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54页。



的廢話来平息工人的已經覺醒了的心。”①

在批判考茨基主義的時候，列寧深刻地論證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策略。

庸夫俗子不懂得“戰爭是政策的繼續”

列寧指出，“社會黨人一向斥責各民族之間的戰爭，認為這是一種野蠻的和殘酷的行為。但是我們對戰爭的態度，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和平的擁護者和鼓吹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區別。我們跟資產階級和平主義者不同，我們懂得戰爭和國內階級鬥爭有必然的聯繫，懂得不消滅階級和建立社會主義就不能消滅戰爭，完全承認國內戰爭即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的戰爭，奴隸反對奴隸主、農奴反對地主、僱傭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的合理性、進步性和必要性。”②

列寧引述了“戰爭是政策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這句名言，指出要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就應當研究戰前的政策，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策。英、法、德、意、奧、俄等國的統治階級，在戰前實行了掠奪殖民地、壓迫異族、鎮壓工人運動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繼續，是帝國主義戰爭。“庸夫俗子不懂得戰爭是‘政策的繼續’，因此他們只會喊什麼‘敵人侵犯’，‘敵人侵入我國’，而不去分析戰爭是由於什麼打起來的，是什麼階級為了什麼政治目的進行的。”③

在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瘋狂地叫囂“保衛祖國”和互相責罵對方的時候，考茨基煞費苦心來掩蓋他們的可恥叛變。他說：“大家都有權利和義務保衛自己的祖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在於承認各國社會黨人（其中包括同我國交戰國家的社會黨人）有這種權利”④。

列寧憤怒地寫道：“這種絕妙的議論是對社會主義的極端庸俗的嘲弄，回答這種嘲弄的最好辦法就是定制一個獎章，一面有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請看，真正的國際主義就是為這種行為作辯護；為了‘保衛祖國’而讓法國工人向德國工人開槍，讓德國工人向法國工人開槍！”⑤

考茨基之流為了辯護他們的背叛行為，還胡亂地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解，說什麼在

① 《給亞·施略普尼柯夫》。《列寧全集》第35卷，第152頁。

② 《社會主義與戰爭》。《列寧全集》第21卷，第279頁。

③ 《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23卷，第24頁。

④ 轉引自《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第195頁。

⑤ 《第二國際的破產》。《列寧全集》第21卷，第196頁。



一八五四年到一八五五年間，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七一年間，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七七年間，战争一旦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站在交战国的这方或者那方。列宁揭穿了这种诡辩手法，指出：“把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政策的继续’，即把争取解放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和垂死的，即帝国主义的，即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来镇压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策的继续’拿来对比，也就等于把尺度和重量拿来对比一样。”^①列宁说，考茨基所引证的以往的战争，有下面这些基本特点：“（一）以往的战争是解决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和推翻专制制度或异族压迫的问题；（二）当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尚未成熟，在战前，没有哪一个社会主义者能够像斯图加特决议（一九〇七年）和巴塞尔决议（一九一二年）那样，谈到利用战争‘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的问题；（三）当时在交战双方的国家内，都没有比较强大的、经过多次战斗考验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政党。”“简单地说来，在所有交战的国家里都谈不上无产阶级反政府反资产阶级的总运动的时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只判断什么样的资产阶级的胜利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害处较少（或者更有益处），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②

考茨基还诡辩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它还带有民族的性质，因为统治阶级虽然有帝国主义的趋势，而人民群众（也包括无产阶级）有“民族的”要求。列宁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具有民族因素的只有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但是，这种民族因素对全欧的战争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参加者来说，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当帝国主义者分明用‘民族的’词句来掩盖赤裸裸的掠夺的目的，肆无忌惮地欺骗‘人民群众’的时候，说战争不是‘纯粹’帝国主义性的人，那就是愚蠢透顶的学究或滑头和骗子。”^③

考茨基附和普列汉诺夫之流说，“实际问题只有一个：是本国胜利还是本国失败。”^④列宁说：“是的，如果忘掉了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这样说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忘掉社会主义，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还有另一个实际问题。是做一个盲从的懦弱的奴隶，在奴隶主之间的战争中死去呢，还是为了举行奴隶之间的‘联欢’以推翻奴隶制而死去呢？”“事实上这才是‘实际’问题。”^⑤

在整个战争期间，列宁都始终不渝地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而斗争。他在《关于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一文中指出，“战时的革命就是

①③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197、212—213页。

② 《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列宁全集》第21卷，第162—163页。

④ 转引自《一幅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插图》，《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

⑤ 《一幅说明国内战争口号的插图》，《列宁全集》第21卷，第159页。



国内战争；一方面，政府在军事上失利（‘失败’），就容易使政府间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另一方面，竭力实现这种转变而又不促使政府失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①

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而是财政资本“心甘情愿”所采取的一种政策，是“工业”国企图吞并“农业”国的一种趋向。列宁指出：“考茨基的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不在于产业资本的统治，而在于财政资本的统治，恰恰不单是要吞并农业国，而且还要吞并一切国家。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把政治上的垄断制和经济上的垄断制分开，来为他的鄙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即‘废除武装’、‘超帝国主义’之类的谬论扫清道路。”②

在批判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个巨著，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半个世纪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的本质、规律和矛盾。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③“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个特点可分三方面来谈：一、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二、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④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了，革命爆发的条件日益成熟；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分割世界所进行的斗争更加尖锐了，斗争双方扼杀对手的愿望更加强烈。

从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中，列宁得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⑤的结论。

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这种不平衡发展是跳跃式的，原来走在后面的国家跳到前面去了，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国家落到后面去了。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54页。

②③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05、103页。

④⑤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9、186页。



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也正是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无产阶级有可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最薄弱的地方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获得胜利。

早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列宁就写道：“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①。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②。

“超帝国主义”论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机会主义“理论”

列宁揭穿了考茨基所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认为这是最精密最巧妙地以科学性伪装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理论。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个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全世界来代替各国财政资本的相互斗争。”^③战争的结局“可能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战争的教训可能加速在和平时期要等很久才能达到的那种发展。如果事情弄到各国之间达成协议、裁减军备和实现持久和平的地步，那末战前曾使资本主义道德日益衰落的那些最坏的原因，就可能会消失”。这个“超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可能在资本主义领域中造成新希望和新期待的纪元”^④。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矛盾会大大和缓。列宁指出，在从前的“和平的”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能够畅行无阻地扩大殖民地和附属国，资本的积聚还很薄弱，垄断企业还没有产生，这时，自由贸易与和平竞争是可能的和必然的。在帝国主义时代，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但是并没有消灭竞争，而是更加剧了竞争，迫使资产阶级从和平扩张转到用战争来重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

列宁说：“资本家分割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毒辣，而是因为现在的集中已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5页。

③ 转引自《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6—287页。

④ 转引自《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0页。



經发展到这种地步,使他們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去获取利潤;而且他們分割世界,是‘按資本’、‘按實力’来分割的,在商品生产和資本主义制度下也只有按这种标准来分割。實力是随經濟政治的发展而变更的;要了解当前的事件,必須知道哪些問題的解决是取决于實力的变更,至于这些变更究竟是‘純粹’經濟上的变更,还是經濟范围以外的(例如軍事的)变更,却是次要的問題,絲毫也不能改变对于資本主义最新阶段的基本观点。”①“‘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結成一个总同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中間的‘暂时休战’。和平的同盟准备着战争,同时也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这两者互相制約,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帝国主义联系、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不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②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論的真正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轉移群众視綫,使他們不去注意現代的尖銳矛盾和尖銳問題,而去注意将来所謂新的‘超帝国主义’的虛假的前途,用这种极为反动的办法来安慰群众,使他們抱着在資本主义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幻想”③。

考茨基还扮演着牧师的角色,說什么許多資本家真正关心世界和平和裁减軍备,不傾心于帝国主义,因为他們从战争和增加軍备中所得到的利益,并不比他們所遭受的損害大。他劝导資本家說,实现資本扩張的最好办法,“不是通过帝国主义強力,而是通过和平民主”④。列宁說,“当爭夺强国特权的武装斗争已成为事实的时候,考茨基就来劝导資本家和小资产階級說,战争是可怕的东西,裁减軍备才是好事。这样做和这样做的結果完全像基督教的牧师从讲台上劝导資本家說,博爱是上帝的教誨,是灵魂的所向,是文明的道德规范。考茨基称为导致‘超帝国主义’的經濟趋势的那些东西,实际上正是小资产階級希望金融資本家不要为非作歹的劝告。”⑤

列宁指出,“考茨基主义”这个国际上的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腐化解体的結果,另一方面是被资产階級偏見所俘虏的小资产者思想的必然产物。“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整个无产階級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論錯誤。必須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的‘民主主义’在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一点也不想冒充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飾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⑥

①②③⑥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5—246、289、287、184頁。

④ 轉引自《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81頁。

⑤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1卷,第205頁。



十 反对社会和平主义

宣傳和平而不同时宣傳革命，就是愚弄群众

列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同时也坚决反对否认革命的社会和平主义。大战爆发后不久，列宁就批判了社会和平主义，他说：“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傳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否认革命战争的积极意义，这种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像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为了推翻民族压迫、为了把封建割据的国家建成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战争，或是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而可能进行的战争。”“在今天，宣傳和平而不同时号召群众采取革命行动，这只能散布幻想，使无产阶级相信资产阶级的仁慈，使他们成为交战国秘密外交的玩具。在这方面，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①

当大战打了将近一年的时候，有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再发表議論，表示希望和平，机会主义者也提出了所谓“民主和平”的口号。列宁指出，百万富翁之所以“同情”和平，是因为他们害怕革命；同时，他们也清醒地知道，只要资产阶级没有被剥夺，所谓“民主的”和平（不割地、限制军备等）不过是空想。而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拥护者和这一类悲叹和平的社会党人，却在鼓吹这种庸俗的空想。列宁把那些用社会主义的詞句宣揚和平主义的人称做社会和平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怎样提出和平问题呢？列宁写道，“和平口号可以同一定的和平条件联系起来，也可以不带任何条件，即不为一定的和平而斗争，而是为一般的和平而斗争。显然，在后一种场合，我们看到的就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根本是一个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口号。一般的和平无疑谁都赞成，甚至基特切涅尔、霞飞、兴登堡和暴君尼古拉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要提出对‘本’民族有利的帝国主义的（即掠夺性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和平条件。我们提出口号的目的，是要在宣傳鼓动中向群众说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区别，而不是要用一个把截然不同的东西‘统一起来’的字眼来调和两个敌对的阶级和两种敌对的政策。”^②列宁着重指出，“我们的理想就是结束战争，实现国际和平，停止掠夺和暴行，但是只有资产阶级詭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列宁全集》第21卷，第140—141页。

②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68—269页。



辯家才会用这种理想来迷惑群众，把它同立即直接鼓吹革命行动割裂开来。”^①

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继续

一九一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一七年初，世界政治形势中开始出现由帝国主义战争向帝国主义和平转变的迹象。交战国双方都已疲惫不堪，后备枯竭；财政资本通过军事利润已经从人民身上剥了几层皮，再剥就很困难了；人民的不满和愤恨愈来愈强烈，革命情绪日益增长。于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签订和约，以便“和平地”分赃，“和平地”解除千百万无产者的武装，用小小的让步来掩盖他们继续掠夺殖民地和扼杀弱小民族的勾当。和帝国主义政策的转变相适应，社会和平主义大大流行起来。

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原则上的一致性在于，他们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不过一部分人为帝国主义效劳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另一部分人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是用空谈“民主”和约，大谈“人道主义、博爱精神、非人间所能有的慈善心（和大智大慧）来粉饰未来的帝国主义和约”^②。

列宁说，社会和平主义者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这个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就是通过暴力继续执行交战国的统治阶级早在战前就已经执行的那一政策。和约也是那一政策的继续，它记下军事行动所造成的敌对力量之间的一些变化。战争本身并不改变战前政策发展的方向，只是加速这一发展。”^③帝国主义所能实现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准备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和平。对帝国主义说来，“战争就是一个像造林业一样的‘工业部门’：要生长起相当高大的树木……即相当丰富的年轻力壮的‘炮灰’，需要几十年的功夫。”^④列宁科学地预言：“如果革命不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成长起来，人类还会经受（在最坏的情况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⑤

阶级压迫还存在的时候，要求“废除武装”，就等于放弃一切革命

在帝国主义战争灾难深重、群众普遍厌战的气氛中，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口号，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警制”或“人民武装”的条文。他们的主要论

① 《和平问题》，《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1页。

②④ 《世界政治的转变》，《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2、275页。

③ 《论“和平纲领”》，《列宁全集》第22卷，第157页。

⑤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3卷，第81页。



据是：要求廢除武装，就是最明显、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軍事化和任何战争。

列宁在《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論“廢除武装”的口号》等著作中彻底批判了这种幻想，他說：“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①在帝国主义时代，有三种革命战争：第一、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第二、被压迫被剝削階級反对压迫階級、剝削階級的国内战争；第三、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况下，还会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資本帝国主义国家干涉的自卫战争。“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反对而且也不可能反对革命战争。”^②

列宁斬釘截铁地写道：

“被压迫階級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喚。我們如果不想作資產階級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記，我們是生活在階級社会里，除了进行階級斗争和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权以外，我們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

“在任何一個階級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現在的雇佣劳动制上，压迫階級总是拥有武装的。不仅現在的常备軍，而且現在的民警——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国，例如在瑞士——也是資產階級反对无产階級的武器。这个道理很簡單，几乎用不着作特別的說明。这里只要指出所有資本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使用軍隊（包括民主共和国的民警在內）镇压罢工者的現象就够了。資產階級用武装镇压无产階級，这是現代資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严重、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③

“无产階級只有把資產階級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棄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銷毀一切武器。无产階級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④

列宁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資本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提出“廢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棄階級斗争的观点，放棄一切革命的思想”，“沒有一点馬克思主义的气味”，是“最庸俗的机会主义和資產階級和平主义”^⑤。

同机会主义者的口号相反，馬克思主义者的口号是：“武装无产階級，以便战胜和剝夺資產階級，解除这个階級的武装。这是革命階級唯一可行的策略，是从資本主义軍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产生并为这个发展所决定的策略。”^⑥

十一 反对民族問題和民族殖民地問題上的机会主义

帝国主义意味着資本的发展大大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条

①②③ 《无产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宁全集》第23卷，第78、74、77頁。

④⑤ 《論“廢除武装”的口号》。《列宁全集》第23卷，第94、95、94—95、93、94頁。



件下的扩大和加剧。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和压迫，激起了被压迫民族人民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在广大的地区发展起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通常把民族问题看成是欧洲“文明”国家的内部问题。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问题越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变成了影响全局的国际的问题，变成了附属国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世界性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才能加强各民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保证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和大战期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论民族自决权》、《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等著作中，对党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纲领和政策作了全面的论证，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民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

机会主义者一方面抹杀各国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同时也抹杀国际上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对抗性矛盾。列宁指出：同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可以建立各平等民族和平联盟的庸俗的机会主义的乌托邦相反，“社会民主党党纲应当提出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的、极其重要的和必然发生的问题：民族已经分成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①。“这种区分是由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市民的空想主义（即认为各独立民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和平竞争）的观点看来，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但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看来，它却是重要的。”^②列宁还说：“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③

列宁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上的两个历史趋向。他说：“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

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1页。

②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1卷，第388页。

③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8页。



的国际统一的形成。”①

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指出：“对于帝国主义，这两个趋向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如果不剥削殖民地，如果不用暴力把殖民地束缚在‘统一的整体’范围内，就不能生存；因为帝国主义只有靠吞并和夺取殖民地才能使各民族互相接近，否则它根本就不成其为帝国主义了。”“对于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这两个趋向不过是一个问题即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共产主义知道：各民族在统一的世界经济中的联合，只有根据相互信任和自愿协定的原则才能实现；各民族的自愿联合，只有经过使殖民地从‘统一的’帝国主义‘整体’分离出来的道路，经过使殖民地变为独立国家的道路才能达到。”②

殖民地、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

列宁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目的是使各民族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平等，主张殖民地、附属国被压迫民族享有自决权，全力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不能不加剧和扩大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它是从帝国主义的后方打击帝国主义、动摇帝国主义统治基础的伟大力量，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同盟军。列宁说：“作为反帝斗争中的一个独立因素的弱小民族，是帮助反帝的真正力量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登上舞台的一种酵母、霉菌。”③

列宁非常关注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热情歌颂殖民地、附属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英勇斗争。他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写道：“当机会主义者还在拼命赞美‘社会和平’，拼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④ 列宁认为，中国的革命，表明“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⑤。他还在《落后的欧洲和

①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28页。

③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2页。

④ 《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

⑤ 《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



先进的亚洲》一文中写道：“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①

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须同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才能打败共同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说：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的时候，被压迫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它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时机来发动起义。他又说：为了取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或者需要被压迫国家的大多数居民……的共同努力，或者需要国际形势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帝国主义列强由于力量的削弱、它们的战争、它们的对抗性矛盾等等，无力进行干涉）特别有利的配合，或者需要某一大国的无产阶级同时举行起义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列举的这后一种情况，从无产阶级胜利所期望的和对之有利的观点来看，是最主要的）。”^②“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放出来。”^③

列宁特别强调，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马克思鉴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自由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社会主义者不但应当要求无条件地、无代价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这个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是承认自决权；社会主义者还应当最坚决地支持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最革命分子，帮助他们举行起义，如果情况许可，还应当帮助他们进行革命战争，反对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列强。”^④他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又说：“如果我们不背叛社会主义，那就应当支持反对我们主要敌人即大国资产阶级的任何起义，只要这不是反动阶级的起义。如果我们拒绝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那在客观上我们就是兼并者。正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在这个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无产阶级今天才要竭力支持被兼并地区的起义，以便明天或者同时进攻被这种起义削弱的‘大’国资产阶级。”^⑤

①③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19卷，第82—83、83页。

②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306页。

④ 《列宁全集》第22卷，第145页。

⑤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27页。



列宁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只支持民族运动中进步的东西。打倒一切封建压迫，打倒一切民族压迫，争取人民和民族的自主权利，这是进步的，是应当坚决支持的。如果超过这个界限去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那就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正是忘记了这个界限。

列宁教导各国无产阶级要“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①。他指出：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阶级要求冒充全民族的要求并把它提到第一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证自己的利益，“因此就产生了同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勾结起来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永远不变的政策。而对无产阶级重要的是巩固本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用彻底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教育群众。”^②“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是空谈民族起义，实际上却同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暗中的反对本国人民的反动勾结”^③。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只要同压迫民族进行斗争，我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给予支持的，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最大胆最坚决。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拥护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不纵容被压迫民族要求特权的趋向。”^④

批判机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谬论

机会主义者大举攻击列宁所提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和俄国的取消派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借口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联系的加强有进步作用而赞成帝国主义的兼并政策，极力反对实行民族自决。考茨基主义者则仅仅在口头上虚伪地宣称拥护民族自决，实际上完全附和前一类人，认为要求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是“过分的”。托洛茨基站在折衷主义立场，对于到底应当怎样对待被压迫民族的实际问题避而不答，客观上支持了社会沙文主义。俄国的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还用“民族文化自治”这一类民族改良主义的口号来同列宁所提出的关于民族自决的革命纲领相对抗。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时代把所有‘大’国变成了许多民族的压迫者，所以帝国主义的发展也必然会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思潮划分得更加清楚。”^⑤他斥责了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他说：如果压迫民族中的社会民主党仅仅一般地鼓吹民族融合，而忘记了，哪怕是一分钟忘记了他们国家的统治者也主张和小民族融合（用兼并

①②④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1、410、412页。

③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⑤ 《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列宁全集》第22卷，第354页。



手段)，那末，这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

列宁揭露了“民族文化自治”这个口号的反动实质，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工具。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一些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神甫、资产阶级的文化。机会主义者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散布“超阶级的民族文化”的信仰，是完全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有利于地主、神甫、资产阶级利用自己在文化领域里的统治地位，去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

列宁指出，所谓“民族文化自治”，实际上就是要使文化教育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领域中分割出来。他说：“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的阶级斗争都首先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内进行的。把学校部门从这领域分出来，第一、这是一种荒谬的空想，因为使学校（以及一般‘民族文化’）脱离经济和政治是不行的；第二、处处迫使打破荒谬的和陈腐的民族壁垒和偏见的，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把学校等等事业分开恰恰是保存、加剧和加强‘纯粹的’教权主义和‘纯粹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①

有些左派社会党人，在民族问题上也曾经有过错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再也不会再有民族战争，任何战争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列宁指出，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显然错误的，而且在政治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人们会从这得出‘解除武装’的荒谬宣传，因为除了反动战争以外，仿佛再也不会有任何战争；人们从这还可以得出对民族运动更荒谬的和简直是反动的漠视态度”。列宁肯定“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和可以设想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②。

列宁说，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是两个不可调和的敌对的口号，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两大阶级营垒相适应，代表着民族问题上的两种政策（也是两种世界观）。”^③

列宁坚决反对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族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思潮，表现了无比鲜明、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列宁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各国革命者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指南。

十二 团结左派，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

战争期间，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都形成了三个派别：一、右派，即社会沙文主义者；二、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即隐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三、左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①③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9、9页。

② 《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5页。



当时，各国党内的左派人数很少，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团结成有组织的力量。这种情况，给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困难。因此，当时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尽管他们起初为数很少)，用他们的名义向人们提示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面来”^①。显然，能够担当这项任务的，只有列宁。

列宁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这项工作的。当时不仅通讯联络十分困难，就是活动的经费都常常没有着落，甚至连日常生活都不能维持。但是任何困难也难不倒列宁。他不但成功地领导了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和各国革命的左派建立了联系。列宁用极大的力量在瑞士组织了布尔什维克出版物的印刷和发行工作。大战爆发不久(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复刊了，列宁的关于战争的著名宣言即《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就刊登在这个报纸上面。通过这个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列宁的思想冲破重重障碍和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广大群众见面了。在列宁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各国的左派逐渐发展起来，并且从一九一五年起，开始向新的国际团结迈出了最初的几步。

国际妇女会议和青年会议

一九一五年三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所属的妇女组织倡议、在国际妇女运动活动家蔡特金主持下召开的。列宁直接领导了俄国代表团的工作，并为俄国代表团起草了提交会议讨论的决议草案。但是由于德国代表团的调和态度，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没有被通过。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虽然指出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并指责了“保卫祖国”的口号，但只是号召无产阶级“为和平而斗争”，对机会主义者的背叛行为不置一词。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草案和会上通过的决议草案有原则的差别。他说：“大会上发生冲突的是两种宇宙观，两种对战争和第二国际任务的想法，两种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一种观点认为，第二国际并没有破产，机会主义这种强大的“内部敌人”并不存在，于是得出结论说：我们不要斥责任何人。另一种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来说，再没有比继续与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玩弄党内外交手腕更有害、更危险的了”^②。

在妇女代表会议以后不久，又在伯尔尼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创办了《青年国际》杂志。列宁曾经参加这个杂志的工作。

① 《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7页。

② 《论反对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179页。



列宁谈到这两次会议时说：这些会议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没有制定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

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团结革命派的重大成就

这个期间，列宁通过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或者用通信的方式，和各国党中的左派革命家取得密切联系，准备召开左派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会议举行之前，列宁写成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用俄、德、法等国文字出版，同时还制定了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送给各国党内的左派讨论，帮助欧洲工人了解布尔什维克对战争的态度和国际无产阶级在这次战争中应当采取的革命策略。

一九一五年九月，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在齐美尔瓦尔得召开。出席会议的三十八名代表中，考茨基主义者和准考茨基主义者实际上占了多数，左派只有八名。列宁出席了会议，组织并领导左派同考茨基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真正的左派占少数，列宁提出的决议草案没有被接受。经过列宁的斗争，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体现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宣布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谴责“保卫祖国”的口号，谴责机会主义者违背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决议。

列宁在评论这次大会时指出，会议通过的宣言，在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划清界限方面迈进了一步。同时，宣言也表现了不坚决、不彻底和畏首畏尾，没有说出全部真理，没有直接说到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叛变，没有指出第二国际的破产及其原因，也没有向工人阶级直接地、公开地、明确地说明革命斗争的手段。

在表决宣言的时候，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了宣言的缺点，但是他们在宣言上签了字。列宁说：“我们中央委员会是否应当签署这个不彻底的和畏首畏尾的宣言呢？我们认为应当签署。至于我们的不同意见，即不仅是中央委员会的也是代表会议全体左翼国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意见，无论在专门决议中，在专门宣言草案中，或在表决妥协性宣言时所作的专门声明中，都直率地提到了。我们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口号和策略。代表会议散发了德文版小册子《社会主义与战争》。我们过去传播，现在传播，将来也要传播我们的观点”。“我们如果拒绝同少数德国人、法国人、瑞典人、挪威人和瑞士人一道迈进这一步，我们就会犯宗派主义错误。”^①

^① 《第一步》。《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6页。



列宁对出席齐美尔瓦尔得会议的左派以及他们在会上的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在代表会议上，团结一致的国际主义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构成会议右翼的、摇摆不定的准考茨基主义者展开了思想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团结，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是代表会议的一个最大的成就。”^①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于“齐美尔瓦尔得国际一开始就站在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②。

同考茨基派可以实行某种妥协，但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决不停止斗争

在齐美尔瓦尔得会议以后，团结起来的左派，组织了自己的常务局，出版了自己的杂志《先驱》。列宁把反对考茨基派斗争的重心，移到齐美尔瓦尔得会议参加者内部，并为召开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开始进行工作。

一九一六年二月，列宁参加了在伯尔尼召开的国际社会党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给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提案和《关于召开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中的许多条文。

第二次代表会议前夕，列宁指示国外各布尔什维克支部动员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一切力量，选举左派参加会议。

为了揭露和批判考茨基主义分子的“民主”和平纲领，给左派一个行动方针，列宁写了《论“和平纲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认为：“社会党人在争取持久和民主的和平的斗争中的主要和基本任务是：第一、应当向群众阐明群众革命斗争的必要性，经常地宣传这一思想和成立相应的组织；第二、必须揭露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社会党人、特别是考茨基主义者关于和平问题和关于第二国际在‘和平纲领’问题上‘意见一致’等等虚伪的和骗人的空洞词句。”^③

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昆塔尔召开了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会议，主要讨论了争取结束战争、无产阶级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左派的力量有了发展。以列宁为首的左派联名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虽然遭到否决，但是，经过列宁的斗争，会议通过了谴责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反对社会和平主义的决议。决议斥责了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

① 《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全集》第21卷，第368页。

②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58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ISK（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全集》第36卷，第393页。



不可能建立持久和平”，“爭取持久和平的斗争，只能包括在爭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之内”^①，并且警告工人不要相信和平主义的谎言，不管这些谎言披着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外衣。

但是，昆塔尔会议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和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基本原则。布尔什维克在投票支持宣言和决议的同时，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后来列宁指出：“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和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如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或放松反对‘考茨基派’、反对马尔托夫辈和切尔诺夫辈……的斗争。”^②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

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以列宁为首的国际革命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说的：“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策略。”只有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才是社会主义的整个将来”^③。

列宁在一封信里写道：“真正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在数量上当真很少吗？请你说说吧！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七八〇年法国和一九〇〇年俄国的例子。觉悟的和坚定的革命者在一七八〇年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在一九〇〇年则是当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当时在数量上是非常少的，只是少数人，顶多只占本阶级万分之一，甚至只占十万分之一。但是过了几年以后，这些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却使群众，使几百万几千万人跟着他们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少数人真正代表这些群众的利益，他们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他们准备全心全意为革命服务。”

列宁问道：“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要根据他们的多少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④

事实证明，列宁这个期间的辛勤劳动没有落空。齐美尔瓦尔得派后来虽然被考茨基派破坏而陷于瓦解，但是团结在列宁周围的左派毕竟成长起来了。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正是这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成为各国革命群众的真正领袖，成为冲击资产阶级统治的先鋒，成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骨干和核心。

（未完待續）

① 《国际社会党人齐美尔瓦尔得派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的决议》。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第54页。

③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第60、57页。

④ 《给波利斯·苏瓦林的一封公开信》。《列宁全集》第23卷，第202页。

